

# 牢固樹立憲法意識 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12月4日是第九個國家憲法日，特區政府、中聯辦共同舉辦2022年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致辭時，就發揮憲法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引領保障作用，提出了「三個必須」：必須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必須堅持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最高原則，必須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在「必須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方面，憲法第一條列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戰勝了黑暴的嚴峻挑戰，進入從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和諧發展新階段，這些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取得的成果，充分彰顯了憲法關於國家根本制度規定的憲制意義，彰顯了國家憲制對於香港社會穩定發展繁榮的決定性作用。新征程上，香港各界都應自覺積極主動維護憲法權威，尊重和維護國家憲制主體，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始終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

程上，香港各界都應自覺積極主動維護憲法權威，尊重和維護國家憲制主體，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始終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

## 特區憲制責任和原則底線

回歸二十五年來「一國兩制」運行實踐充分證明，必須堅持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切切實實把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作為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有效運作的根本大義和根本要務，這不僅是憲法規定的包括香港特區七百多萬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也是特區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架構當仁不讓的憲制責任。**堅定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是香港法治的憲制責任和原則底線，唯有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才能切實守護好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市民的根本福祉，才能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無論是特區的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機關，都必須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己任。**

香港各界還必須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只有徹底擺脫港英管治的影響，丟



議會內外嚴剛

棄與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相衝突的舊司法觀念，讓愛國精神牢固確立並發揚光大，讓愛國者成為特區管治架構的主體，憲法意識才能在香港真正深入人心。

特別是在司法實踐當中，必須牢固樹立國家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與凌駕性法律威權，準確把握理解基本法及國安法的法律原意要義，用基本法及國安法統轄特區司法實踐，杜絕司法運作過程中對基本法及國安法的曲解誤解，才能真正在彰顯公義的司法實踐中，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在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方面，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發表主題演講時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特區依法履行維護國安的憲制責任，取得明顯成效；但特區維護國安的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香港國安法能否在一系列重大國安案件中，得到全面準確實施仍有待檢驗。

鄧中華表示，黎智英案的處理過程中

出現一些現象「值得高度警惕」，這一點確實值得香港各界深刻反省與警惕，也確實說明了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必要性、緊迫性，要繼續堅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抓住事關港澳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把該管的堅決管起來、把該糾正的堅決糾正起來、把該立的規矩堅決立起來。」一方面用好用中央的權力，強化對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的監督；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特區治理體系，着力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構建「中央主導、特區主責、治理高效」的管治模式。

## 不折不扣貫徹落實國安法

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憲法及基本法都有明確規定，只是有些人刻意將「高度自治」曲解成「完全自治」。為此，必須加強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對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認識，確保中央治港方略能夠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到香港的社會發展中，讓香港特區能夠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持續發揮自身優勢。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

須堅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必須維護「一國」主導「兩制」的憲制原則，必須堅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中央依據憲法及基本法對香港行使的全面管治權是「一國」的具體體現，是特別行政區依據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的核心內容，更是「兩制」有效運作的根本前提。只有準確把握「一國」的憲制主導，才能有效發揮「兩制」的獨特優勢。

行政長官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具體體現。黎智英案不僅要參考普通法的司法實踐，更要以大陸法系的國安法為準繩。只有準確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特別是基本法確定的特區管治架構**堅定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主體責任，才能夠確保香港國安法在司法實踐中，更加全面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也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從根本上維護市民大眾的福祉，以真正彰顯香港國安法所顯現的法治精神。**

香港立法會議員

# 徹底「去殖化」增強愛國精神



議論風生

楊莉珊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2022年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指出，擁護和信仰憲法，離不開對國家民族的情感認同。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增強香港同胞的愛國精神。只有愛國精神牢固確立並發揚光大，完全徹底擺脫殖民主義的影響，憲法意識才能在香港真正深入人心。這一講話點出了香港當前的重要工作所在。回歸前的香港，是被英國通過侵略戰爭強行竊據和「租借」的中國領土，百多年來港英政府在香港實行「殖民管治」，在香港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多個層面打上了「殖民」烙印，影響深遠。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25年，要增強香港市民國民身份認同、增強市民的民族文化認同，推動國民教育和「去殖化」都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 增強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

目前，香港不少街道名、學校名、建築物都以港英相關的英國人命名，甚至還保一些帶有侮辱性的英文地名，如水坑口街（英文名為Possession Street，即「佔領街」）等。回歸後，仍繼續使用這些具有恥辱性的名稱，實在令人無法理解。早前有立法會議員建議，以中國歷史人物、傑出人物命名公園、遊樂場等設施，有關做法同時有歷史教育作用。筆者認為有關建議十分可取，特區政府可研究將具有「殖民」色彩、恥辱性的街道名等，改為對建設國家有貢獻、為國家和民族犧牲的歷史人物，或其他傑出人

物命名。更改部分街道名稱只是「去殖化」的第一步。然而，由於過往未有積極推動「去殖化」，結果被反中亂港勢力利用，誤導部分不認識正確歷史的市民，最後更衍生出非法「佔中」和黑暴等危害國家安全、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影響到市民的安居樂業的惡劣事件。

港英「殖民管治」對香港的影響不僅僅是街道名稱，更涉及文化、政治、法律等不同範疇。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但不少本地法例仍然有濃厚的影子，例如條文保留「女王陛下」、「總督」等字眼。

不少人均認同法律「去殖化」不能再拖。有立法會議員指出，香港回歸25年，當然要捍衛香港憲法權威同特區憲制秩序，但好多相關法律未能正確反映效忠對象，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5條「襲擊女王」罪，就相當不合時宜。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快法律適應用。

事實上，容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在本港出庭的做法本身就不當，傳媒報道，包括澳洲、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早已不再容許英國大律師到當地出庭。香港法律界選委馬恩國指出，之所以有此安排，是因為這些國家及地區都尊重自己司法獨立，落實法治獨立的政策，

以及顯示對本土培養的法律人才有信心。

香港的「去殖化」已經關乎國家主權安全，是一個需要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去殖化」要從對中國文化的自信中最終找回民族精神，完成國家認同。提升港人的文化自信的根本是依託中國文化，而不是鼓吹狹隘的「本土主義」。香港文化的根生性在於中國文化，只有從中國文化的根基入手才能真正完成港人的國家認同目標。

## 結合正確的歷史敘事

香港與祖國一直緊密相連，近代中國以來的新文化同樣對香港產生重要影響。不論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化都應當在香港有所體現。總之，要將香港的近代史與內地近現代史的敘事結合起來，將香港歷史置於中國近代歷史演變的總體發展邏輯中。港人的國家認同應當是具體的現實的認同，而不是抽象的，單一視角或者空洞的認同。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共同承擔的任務。香港不僅要從歷史和文化傳統去尋找香港與內地的共識，更重要的是兩地文化之間的互通，尋找現實的共識。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有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實保障，在實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大輝煌，一定能夠同祖國人民一道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政策思考

蘇曉明、林珩彤

就算是平時不多留意文化藝術活動的市民，近日也會見過鋪天蓋地的M+特別展覽「草間彌生：一九四五年至今」的宣傳品。該展覽不單是M+博物館今年旗艦展覽之一，更是有銀行成為特別展覽的首席贊助，有關銀行也成為M+首個領銜合作夥伴，這種合作模式激發起筆者對文化和金融行業互相合作的一些探索。

香港的文化藝術活動一向不乏金融機構贊助，例如巴塞爾藝術展、藝趣嘉年華都是由金融機構贊助，中銀香港也是香港故宮博物館與戰略合作夥伴，香港故宮最新特別展覽「藝苑珍珍——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名品」，亦是由金融機構贊助。而許多海外國家和地區的殿堂級博物館和重大藝術活動都離不開金融機構的支持。

「文化+金融」這概念並非新鮮事，本地金融機構與文化界有相對豐富合作的經驗，但特區政府的政策卻鮮有提及。反觀內地這概念是政策重點，基本上都由政府主導或半官方機構大力支持。本文將簡介內地文化金融政策發展。

文化金融是內地文化政策非常重要的部分，被視為國家的特色金融業態之一，採取了相對頂層的政策設計。基本上，它是指為服務文化及創意產業而形成從信貸、融資、投資到資產管理等一系列的特殊金融活動。一方面，金融機構能夠賦能文創業，為文化發展提供資金和其他類型的支持，讓文創企業借助金融的力量發展自身業務；另一方面，文創產業也為金融機構開拓文化市場和空間，可為金融行業提供拓展轉型的方向。

2014年，文化部（現為文化旅遊部）、人民銀行、財政部共同發布《關於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從中介服務體系、信貸、直接融資、對外貿易、文化消費、資

產管理等多方面對文化金融發展作出了部署。這份文件算是目前最新的全國性文化金融專門文件。

隨後，文化金融的公共政策體系逐漸成熟，成為文化生態整體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發布《「十四五」文化產業規劃》，第八章也提出要深化文化與金融合作，包括從完善政策體系、創新服務機制，以及擴大投資方面入手。除此之外，2019年發布的《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送審稿）》亦有專屬文化金融的章節。

## 大灣區建設提供新機遇

地方政府層面，文化金融也受到重視，更被納入區域發展策略。北京、深圳、廣州、成都等地都有相應的文化金融作為。例如2018年北京銀監局、北京市文資辦發布《關於促進首都文化金融發展的意見》，持續發展當地的文化金融服務體系。其中一個具體例子是今年9月，北京銀行將為國家文創實驗區中的文創企業提供超過500億元的信貸支援。數據顯示，國家文創實驗區已經累積為1847家文化企業提供貸款融資257億元，成功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近三分之一。同時，國家文創實驗區也是全國首個超過千億的文化產業功能區。

深圳市亦於今年6月發布《關於推進文化與金融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透過多年前已成立的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促進文化金融發展，相信日後也會有更多的具體例子出現。

顯然，香港特區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文化金融會是未來文創產業發展的思考方向之一。如今特區政府與業界逐漸深化「產業化」發展，自然要開始想想如何吸引更多資金支持、如何擴大市場規模等問題。香港有穩健的金融體系、豐富的營商環境和極具創新能力的人才，那麼套用到文創產業時，又能否擦出新的火花呢？

團結香港基金藝術及文化研究主任、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 歐美難分手但漸行漸遠

一是歐洲敢於對美國說不，而且不僅停留在口頭上。比如奧巴馬反對亞投行，但歐洲多國紛紛加入。美國多年來反對俄歐之間的北溪輸氣管道，歐洲就堅持到底。中歐投資協定也是不願美國公開反對達成。特朗普對全球發動貿易戰，敢於對打並堅持到底的只有歐洲和中國。

如果說這些涉及歐洲直接重大利益事情有可原，但有時美國推動一些和歐洲又沒有直接關聯的事件時，也會積極阻撓。典型的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法德聯合中俄一起反對，迫使美國放棄聯合國投票，在缺乏正當性的情況下出兵，付出了重大的道義代價。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一直明裏暗裏阻撓歐洲一體化，像特朗普這樣的政治素人毫不顧忌政治正確，無論上任前還是上任後都公開聲明大力支持英國脫歐，還挑撥說歐盟是拖在英國腳上的腳鍊鐵球。一向反對自由貿易的特朗普甚至承諾與英國達成貿易協定。

二是不可能像遏制中國一樣隨時直接出手，而需要很複雜的、高難度外交操作。比如利用北約東擴和插手烏克蘭局勢，製造一場危機。它再借危機乘機削弱歐洲，

這需要各方有意無意的「配合」、「諷刺」才能達成，多少有一點可遇不可求的運氣成分。

另外，在如何面對中國崛起上，美歐有着根本的分歧。美國把中國當作頭號威脅，竭盡全力遏制，但歐洲卻把中國定位為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原因主要有三個：

一是中歐相隔遙遠，歐洲現在也不追求霸權，雙方不存在地緣政治張力。二是歐洲要想戰略自主和強化自我發展，現階段就需要全球是一個多極世界。這樣它才能左右逢源。特別是中美博弈，歐洲是直接的獲益方，也是它在中美之間都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三是中歐雙方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歐洲長期以來大多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202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歐洲第一大貿易夥伴，2021年雙邊貿易額突破8000億美元。除了市場，歐洲在很多領域對中國形成了依賴。目前包括衛生醫療用品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相關產品在內的137種商品中，歐盟有一半都依賴中國的供貨。被歐盟定義為「至關重要的」30種金屬中，有19種主要依賴中國的出口，這導致歐盟的能源轉

型都離不開中國。

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超過100萬個工作崗位直接依賴中國，間接依賴的更多。幾乎一半的歐洲在華投資來自德國，其工業所需的稀土和其他金屬有70%來自中國。46%的德國企業依賴中國供貨商，一旦停止供貨，德國將有半數企業不得不停產。

雖然美國為了霸權可以犧牲經濟利益，但歐洲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尤其重要的是，中歐經濟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安全依賴美國的歐洲之所以敢說不，其底氣就來自於俄羅斯的能源和中國的經濟。已經失去俄羅斯的歐洲再失去中國，就徹底淪為美國的附庸。

## 歐打「中國牌」向美國示威

這就是為什麼德國總理朔爾茨一定要在G20之前訪問中國，馬克龍在訪問美國之後不久表示希望訪問中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早前也來到中國訪問。當然外界也可以解讀為這是歐洲同時打中美牌，但更多的是在向美國發出信號：如果美國不回應歐洲的關切，它們就轉向中國。除了歐美在最高戰略利益上的分歧外，

美國民粹主義崛起也嚴重影響了雙邊關係。雖然民粹主義席捲全球，但歐洲最重要的法德兩國還是擊敗了它的挑戰，歐盟也掌握在建制派手中，但美國的特朗普卻獲得勝利。他任內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核協議，甚至連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退出。這都是歐盟反對的。

但今天的美國，民粹主義已經成為主流。不僅共和黨已經特朗普化，就是民主黨在民意壓力下也不得不在許多事務上迎合。到現在拜登也不敢談判任何貿易協定，他力促成立的印太經濟框架這種國際多邊經濟合作組織卻先吧關稅剔除出來，他任內實行的補貼超過特朗普。這也是為什麼加拿大經濟學家勒米厄指出「拜登是更富有人性的特朗普」。法國媒體也評價說拜登同樣奉行美國優先的政策，只是做得更加巧妙。現在特朗普已經宣布參選，不管他能否勝選，美國的特朗普化仍會洶湧持續。歐美關係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面。

總體上，正是歐美雙方的結構性戰略利益分歧，決定了雙方必然漸行漸遠。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觀察 宋魯鄭

法國總統馬克龍對美國的訪問不出外界所料，在歐盟最大訴求的能源價格和反通脹法案方面一無所獲。正如德國媒體所評論的：拜登不肯作出半點讓步。這也是當下歐美關係的真實寫照。

利益錯綜交織的歐美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依舊能夠維持，但雙方漸行漸遠。根源在於雙方國家最高戰略利益方面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

## 美積極阻撓歐洲一體化

美國最高國家利益就是捍衛其全球霸主地位和美元霸權；歐盟則希望加速歐洲一體化，成為統一、強大的世界一極。歐盟現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可以說除中國外，歐盟最具取代美國的實力。美聯儲認為對美元地位構成挑戰的三大貨幣，排第一位的就是歐元。所以如果歐盟目標達成，將直接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更令美國感到棘手的是，歐洲是有共同價值觀的盟友。這導致兩個後果：